

駢文史論

姜吉聞著



书名题字：姜书阁
封面设计：徐中益

骈文史论

PIANWEN SHILU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8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7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850

书号 10019·4027

定价 3.40 元

序

昔余志学之年，适就读于沈阳一中，颇以能文蜚声于师友之间。然所素习者大抵不过唐、宋八家古文。于今之语体，初未闻知，此固时地之所限，非鄙而不为。而于汉、魏、六朝骈俪之文，亦少诵读，是则教者之过也。

是时，余方少年，顾好作诗，而苦于腹俭，少词采，乃始有志博览，欲求华藻。偶得《经史百家杂钞》及《百子金丹》，数月，尽读之，复摘录所喜之章节、辞句，至二十卷，朝夕讽诵，以为至宝。继续《文选》、《庄》、《列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遂稍得为文门径。尝于课中作《雪》、《年》二文，似赋而不韵，盖骈俪之体耳。呈诸吾师沈北喻涤六先生，师不易一字，而密加圈点，评曰：“胸中雪亮，腕底风生。”余遂以此自豪，并自信其于文无所不能。然亦从此自画，不复为之矣。

一九二五年，余在唐山学铁道工程，不愜于衷。明年，入清华，学政治，时年十九，课馀著《桐城文派评述》（有商务印书馆1930年《国学小丛书》本及1933年《万有文库》本），旨在撰史，非欲为桐城家张目也。而世之读我书者多疑余少好其道，老而不移。噫！岂其然欤？

余既学政治，兼及法律、经济诸社会科学，毕业以后，又为生计所驱，从政、任教、主报馆笔政，达十九年，于文章之道，遂不复讲。虽然，少习文史，嗜书如命，涉世以来，五十

余年，纵在颠沛流离之时，或处沈沦困阨之境；荒山岁晏，午夜梦回，故纸陈编，恍然在目；佳章丽句，诵之于心，固未尝一日忘之也。况乎今者，天回地转，日月重光，起废振衰，文章大盛，吾又焉能自外于明时，而不思有所述作，以效涓埃之报耶！执笔著书，此其时矣。

比年以来，余除整理旧稿三四种，先后付梓问世外，已新撰《诗学广论》（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）及《汉赋通义》（将于年内由齐鲁书社出版，现正排印中）论诗与赋矣。兹又著此《骈文史论》，以述二千年骈体文学之起源、发展与夫演变、衰亡之迹，并于历代各家各派之观点、主张及其创作实绩，略以己意有所论评。非敢谓其必当，但求无愧我心；愿及有生之年，就正贤达之士。

至若骈文之体，其优劣短长，非片言可尽，且已详具书中，姑不赘述。然此书篇幅较大，读者得无病其引录过繁欤？此则不可不预为之说，先以告罪。吾以为近世治文学史者多薄骈文而不加论述；偶或及之，率皆斥为形式主义而草草带过，或片鳞隻爪，莫明原委。青年学子于骈体之文咸感陌生，或欲略观梗概，而古籍丛残，检阅为难。余故不得不于论述之时，精选少许例文，用便说明。其或可以节取片段章句，佐助体认者，则不录全篇，但求足供参证而已，不敢过为繁累也。

年近八旬，精力幸未衰竭，兹编既成，良深快慰。独不知明日明年尚复能有所撰著否耳。仰天呵问，祈赐长年！

姜书阁

一九八四年七月

于湘潭大学松涛馆寓楼

目 录

序	1
叙说第一	1
一 文体之称	1
二 骈、俪、四六、文章	3
三 骈文特征	7
四 骈文发展历程	13
经史丽辞第二	18
一 丽辞之起	18
二 《尚书》中之丽辞	20
三 《诗》、《易》中之丽辞	22
四 先秦史传中之丽辞	29
诸子丽辞第三	39
一 儒家诸子中的丽辞	39
二 道家诸子中的丽辞	49
三 法家诸子中的丽辞	59
四 名、墨、兵、杂诸家书中的丽辞	66
屈宋骚赋第四	74
一 屈、宋骚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	74
二 屈原《离骚》中的丽辞	77

三	屈原《九章》中的丽辞·····	79
四	屈原《九歌》中的丽辞·····	81
五	《天问》和《招魂》、《远游》中的丽辞·····	82
六	《卜居》和《渔父》中的丽辞·····	85
七	宋玉的《九辩》（附《大招》）·····	88
八	宋玉的《风赋》和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赋·····	91
汉赋骈始第五·····		98
一	赋与骈·····	98
二	贾谊和枚乘（附庄忌和淮南小山）·····	100
三	司马相如和东方朔、王褒·····	108
四	扬雄辞赋及其他·····	129
西汉文章第六·····		137
一	经传和子、史，诏令和奏疏·····	137
二	秦代李斯的遗文·····	139
三	西汉初期文章——从陆贾到晁错、邹阳·····	143
四	汉代儒家经传遗文·····	154
五	西汉诸子——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盐铁论》 以及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等·····	162
六	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·····	188
汉赋衰变第七·····		196
一	汉赋盛极而衰·····	196
二	汉赋初变——班彪和冯衍·····	199
三	汉赋之再衰再变——杜笃、傅毅、班固·····	206
四	骈赋形成前的赋坛——张衡、马融、王逸、 赵壹、祢衡等·····	220
东汉文章第八·····		229
一	东汉文坛·····	229
二	东汉初期桓谭、朱浮、卫宏和袁康·····	231

三	王充《论衡》·····	239
四	班固《汉书》及其他·····	243
五	王符《潜夫论》和崔实《政论》·····	250
六	赵晔《吴越春秋》和应劭《风俗通义》·····	255
七	汉末大骈文家蔡邕·····	260
建安骈体第九 ·····		267
一	建安文学与骈赋、骈文·····	267
二	仲长统的《昌言》·····	270
三	曹操与骈文·····	273
四	曹丕、曹植与骈文·····	275
五	建安七子的骈文（附邯郸淳、吴质和应璩）·····	285
六	诸葛亮的骈文·····	297
魏晋骈文第十 ·····		299
一	魏、晋之际，六朝之始·····	299
二	魏蒋济、桓范、王肃、夏侯玄、李康、 杜恕等的骈文·····	301
三	傅嘏、何晏、王弼等的骈文·····	311
四	嵇康、阮籍与其他“竹林名士”的骈文·····	318
五	以张华、左思、潘岳、陆机为代表的西晋骈文家·····	326
六	东晋刘琨、郭璞、葛洪、孙绰、陶渊明的骈文·····	336
宋齐骈文第十一 ·····		353
一	“晋、宋”，“宋、齐”和“齐、梁”·····	353
二	从傅亮、何承天到谢灵运和颜延之的骈文·····	355
三	范晔、刘义庆、鲍照之与骈文·····	363
四	南齐永明声律说与骈文诸家——周顒、王融、谢朓、 陆厥、沈约等·····	368
梁陈骈文第十二 ·····		379

一	梁、陈骈文与北朝骈文·····	379
二	从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论及六朝的文笔之辨·····	381
三	江淹、任昉、陶弘景、刘峻、丘迟、吴均、 裴子野的骈文·····	384
四	从萧衍、萧统到宫体文学的倡导者萧纲、萧绎及其追 随者徐摛、庾肩吾等·····	394
五	徐陵及陈代其他骈文家——周弘正、沈炯、江总、张 正见、顾野王等·····	403
六	庾信入北前北朝的骈文家——温子昇、邢邵、 魏收等（附王褒）·····	415
七	庾信及其骈文·····	425
八	隋代骈文家和他们的骈文·····	435
唐骈衰变第十三·····		445
一	唐代骈文衰变的必然·····	445
二	初唐四杰——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等 的骈文到陈子昂的变革·····	448
三	所谓“燕许大手笔”张说、苏颋及其前后的骈文·····	457
四	古文家韩愈、柳宗元及其前后的骈文·····	463
五	陆贽奏议之骈体·····	468
六	李商隐的四六骈文·····	473
七	四六骈文向社会下层发展·····	476
宋骈四六第十四·····		485
一	宋代四六骈体的衰变·····	485
二	北宋初期从王禹偁到西昆体的四六文·····	486
三	欧阳修、苏轼与北宋四六骈文·····	490
四	曾巩和王安石的四六骈文·····	496
五	汪藻和南宋人的四六文·····	499
六	王安石创为经义之文及其流弊·····	502

七	宋人歌舞剧曲的四六致语·····	505
明清骈馀第十五	·····	512
一	金、元的骈文·····	512
二	明代的骈文·····	521
三	清代的骈文·····	529
四	明、清的制义八股·····	533
五	骈文的馀裔——联语·····	539

叙说第一

一 文体之称

骈文为文体之称，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，所以要说明何为骈文，就有必要先言散文。

现代文学样式有所谓散文这一大类，它是与诗歌、戏剧、小说并列的，内容和形式都比较自由，没有什么限制，也无韵律的拘束，既用来记叙事物、抒情写意，也可用来发表议论、阐明道理。但这是新文学中文学样式(品种)的散文，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跟骈文相对待的散文，涵义不同，并非同一范畴。

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所说的散文，是只就其行文所运用的词句之专用散而不整，奇而不偶，长短错落，无韵律之拘束者而言。且因此也就少用典事，以古朴为尚，不务词藻之华丽。所以古人往往以散文与诗词骚赋等有韵而讲究辞藻者相对比。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言：“山谷(按：黄庭坚号山谷道人)诗骚妙天下，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。”又引周益公(按：周必大封益国公)之语：“四六(按：宋称骈体文为四六文)特拘对耳，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，与散文同。”这就说明了散文是与诗骚及骈文等相对而称的，其间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讲求韵律和对偶。

散文既如上述，则与之相对的骈文，其所要求之形式，自可推知。

唐代以前，文章原无骈与散这两种文体之分。就文体名称而言，确是如此；但就文章作品而言，则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却早已存在，并己为文人学士所共知。正因为是这样，世之论骈文之发展者，莫不溯源于秦汉，至迟也要从东汉末年讲起。

骈文之称，最早见于唐人柳宗元的《乞巧文》：

眩耀为文，琐碎排偶；抽黄对白，唳唳飞走；骈四俪六，锦心绣口；
官沉羽振，笙簧触手。

这里正是讲明白了骈俪四六之文，专务于排偶对仗，锦绣雕饰，讲求音律，谐调宫羽。接着，就又有位唐代骈文大家李商隐，在他的《樊南甲集序》中，以“古文”与“今体”对称，而“古文”则指散体，“今体”即指“骈文”，也就是他在此径名之为“四六”者。他说：

樊南生十六能著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，以古文出诸公间。后联为郢相（按：令狐楚）华太守（按：崔戎）所怜，居门下，时勅定奏记，始通今体。……往往咽喉于任、范、徐、庾之间。有请作文，或时得好对切事，声势物景，哀上浮壮，能感动人。……仲弟圣仆，特善古文，……常以今体规我……作二十卷，唤曰《樊南四六》。四六之名，六博格五、四数六甲之取也。

由此可见，骈俪之文，或称骈文，或称俪体，自中唐柳宗元时即己有“四六”之名，至晚唐李商隐便称其骈体章表奏记之作为“四六集”，视为“今体”，以与“古文”之散体相对。骈体文之称为“今体”，是因为这时官吏应世文字必须以骈四俪六出之，而不能用前古的散文；散体虽经陈子昂以至韩愈等人的提倡，甚至形成古文运动，但迄不能普遍通行于统治阶级的官方，即不能作为政府公文文体使用，故只称之为“古文”。而且到北宋时期，还有名之曰

“平文”，以与“对偶之文”相抗衡者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四“艺文一”有云：

往岁士人，多尚对偶为文。穆修、张景辈始为平文，当时谓之古文。

散文既以“平文”为名，可见沈括时代（北宋中叶）士人仍以散体古文为平淡无奇的文体，远不如“对偶为文”的骈体之足尚了。

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散文既是古文、是平文，是散体不整齐的平淡朴素的古文，其主要特征是无固定韵律，不雕饰词藻，自然都属于写作艺术和技巧方面的问题，用这种散体不只可以写现代文学意义的散文，也可以用来写小说、戏剧。同样，与之相对的骈体，也可以用来写小说、戏剧及现代文学意义的散文。这样看来，古之散文既与现代文学意义所谓的散文不是同一范畴，骈文当然也与现代文学意义所称的韵文和诗歌毫不相干了。换言之，古之散文既不能等同于英语的 prose，骈文更不是英语的 verse，两者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有品种，未可与今日的西方文学样式或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类别妄加比附。

二 骈、俪、四六、文章

骈体之称，其义云何？请先释“骈”字。

《说文》：“骈，驾二马也。从马，并声。”段玉裁注引《汉书·平帝本纪》“立辚并马”，服虔之解：“立辚，小车也；并马，骖驾也。”段氏按曰：“骖读同伉俪”（之俪）。又曰：“并马谓之俪驾，亦谓之骈。并、骈皆从并，谓并二马也。……王肃云：‘夏后氏驾两谓之丽’。骈之引伸，凡二物并曰骈。”又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卷二

十七《庄子·骈拇》释文曰：“骈，……《广雅》云：‘竝也’；李云：‘併也’。”（按今本《广雅》无此文，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在卷五《释言》篇据《释文》引补。）由此可知，并驾二马谓之骈，引伸之，凡二物并皆可曰骈，是骈即并也，併也。然则，骈文亦言其文句皆两两相并而成偶者也。

骈体亦称骈俪，次请释“俪”。

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俪，耦也。”王念孙《疏证》引“成十一年《左传》‘鸟兽犹不失俪’，杜预注云：‘俪，耦也’。”又曰：“字通作丽，又作离。”《经典释文》卷十《仪礼·士昏礼》“束帛俪皮”云：“音丽，偶也。”又《士冠礼》释文曰：“音丽，两也。”《聘礼》释文同此。是知俪义为耦，为偶、为两，亦犹骈义为“二物并”，盖俪同丽，而丽原为两鹿皮相并也。以是知骈文亦称俪体，而俪通作丽，故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有《丽辞》篇，其实即论文章之骈偶属对者也。

至于“四六”之称，则源于柳宗元“骈四俪六，锦心绣口”之语，盖谓四言句与六言句间错相对。例如庾信著名的《哀江南赋序》有云：

日暮途穷，人间何世？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；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荆壁睨柱，受连城而见欺；载书横阶，捧珠盘而不定。钟仪君子，入就南冠之囚；季孙行人，留守西河之馆。申包胥之顿地，碎之以首；蔡威公之泪尽，加之以血。钓台移柳，非玉关之可望；华亭鹤唳，岂河桥之可闻？

这样的文章，读起来音节比较条畅而有规律，正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篇所说：“若夫笔句无常，而字有条数。四字密而不促，六字格而非缓”，便是说四字和六字句在音节上是不促不缓，比较合适的。但骈文句虽以四六字为主，却也有三、五、七乃至

八、九、十字者，其故则是：“或变之以三五，盖应机之权节也。”至于李商隐所云：“四六之名，六博格五、四数六甲之取也”的解释，本很难懂，即据清人冯浩笺注来看，也似乎没有多少道理，故不足取。自晚唐以至南宋之末，凡为章、奏、制、诰，皆用此体，故宋人每言“四六”，几全指当时这种政府官文书而言，宋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七记一故事，可为证明：

司马温国文正公（按：司马光封温国公，溢文正）文词深醇，有西汉风。……神宗即位，首擢公为翰林学士。公力辞，不许。上面谕公：“古之君子，或学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学，惟董仲舒、扬雄兼之。卿有文学，何辞为？”公曰：“臣不能为四六。”上曰：“如两汉制诏可也。”公曰：“本朝故事不可。”上曰：“卿能举进士，取高等，而云不能四六，何也？”公趋出。上遣内臣至闕门，强公受告，拜而不受。趋公入谢，曰“上坐以待公”。公入，至廷中，以告置公怀中。不得已，乃受。（按：《名臣言行录》此段文字自“神宗即位”起，即全录自苏轼《司马温公行状》，并一字不差，故事当可信。）

由此可见，宋人凡任翰林学士，职知制诰，无不能为四六，擅长四六，因此时制诰必须以四六之体出之也。亦以是故，士子学文章，应进士举，也必然要学这种文体。司马光《上始平庞相公述不受知制诰书》（见《司马温公文集》卷九）说他自己：“至于属文，则性分素薄，尤懒为之。当应举时，强作科场文字，虽仅能牵合，终不甚工。……向者，年二十余，相公在枢府，始令学作四六文字，供给牋奏。虽承命不敢不勉，而终以愚陋，不能进益。自相公出镇以来，亦遂舍置，未尝复为也。时时答亲旧书启，则不免假手于人。今知制诰之职，掌为天子作诏文，宣布中外，岂可使假手答书启者为之耶？”更可以说明当时士子学文应举，以至做官应世，皆须用四六文，虽在大文章家、大政治家、大史学家如司

马光,也不能例外。因宋代四六已成为仕途所专用之文体,故一般即以四六称当时通用的这种骈体文字,而成为骈文之同义语和代语了。其实即在此时的章、奏、制、诰等骈文中,也并不是尽作四言六言句的。

骈体、俪辞、四六,自唐以来的古文家多加菲薄,甚或斥之为“怪”;而今之治文学史者也几乎予以全盘否定,不给它以应有的地位。其实,即仅就其艺术技巧而论,两千年来此种骈四俪六之体也还是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要求,有文有章的。

请先释“文”,然后并及于“章”。

《说文》:“文,错画也,象交文。”又《易·系辞下》:“物相杂,故曰文。”又《广雅·释诂》:“文,饰也。”文之本义就是要交错,物必交错始能成文,《礼记·乐记》所说“五色成文而不乱”,亦言五色交错以成文饰也。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》“画绩之事,杂五色。……青与赤谓之文,赤与白谓之章”,正说明了文章是要五色错杂以成其饰的。俞樾《王子安集注序》说得很好:“物相杂谓之文。《说文》曰:‘文,错画也,象交文’,盖必相交相错而后成文。故骈俪之文,文之正轨也。”俞樾这话,是从文的本义来讲的。其实这不仅合于中国古代文论,即使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衡量,也基本上是正确的。因为文学艺术不能没有文采藻饰和错杂雕画;反之,凡是平板叙述或单纯说理,有质无文,则非野即史,便不可能有什么文学价值,也就不算“文之正规”了。今人或将文学与文章加以区别,以为有形象而艺术性强的才算文学作品,不具备这样条件的只能算文章。古人并不如此看,古以文章连用,文即是章,也就是文章,如上举《考工记》“青与赤谓之文,赤与白谓之章”,均只是说“画绩之事,杂五色”,初不以青、赤、白为异,正与下边“白与黑谓之黼,黑与青谓之黻”,是一样的,不过

言黼黻文章皆在于错杂五色而已。盖章之义为明也，著也，显也，惟五色错杂然后乃能章明显著而成文耳。这正符合文学艺术的形象性的要求，所以为文而章、有文有章、以至“焕乎其有文章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，这样的“骈俪之文”也就不能不是“文之正轨”了。我们固不必如刘师培那样绝对化地主张：“非偶词俪语，弗足言文”（见其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第一课《概论》），但也不同意走另一极端，把骈俪四六之文摒斥于文学范围之外。

三 骈文特征

无论对骈文一体作如何评价，在得出结论以前，必须先找出它的特征，就其所以异于散文（韩愈所提倡的古文）者，一一了然于心，然后以之与散文进行对比，究其优劣短长，方为有据。这对于骈文史的研究，也是必要的条件。

先秦文章，原无骈散之分。秦汉以还虽渐有骈意，但也只是初萌其端，若江河之滥觞，还不能形成巨流。经过七百年的发展演变，才达到成熟的阶段，至梁、陈的徐陵、庾信，遂为骈文高峰，体制规格，乃完全确立。其后，历唐至宋，虽仍有变化，而骈散之间的主要差异却基本无所改变。因此，如欲探索骈体特征，就只能就徐、庾以后的骈文来寻绎；宋、齐以前，乃至魏、晋以前诸家的作品，虽选家亦多有选录，但骈文的某些特征或不具备，或虽具而不显。

上节释骈、释俪、释文章，已清楚地指出了骈体的基本特征，首先是同样结构的词句之两两并列，如骈之驾二马。这种并列的排句，自然以两句或四句为主，但早期的骈文则往往不限为偶数而间有三句者，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：

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；
其弱也，五伯征而诸侯从；
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

这个例子也表现了句式虽同而字数却不一定绝对相等。无论句数不偶而三也好，字数间或略有增减也好，反正句式既皆相同，成排并列，就不能不认为是排句而合于骈俪的条件了。但是晋以后骈句就几乎全用两句或两排，而字数也必然相等，无复参差错落了。如陆机的《豪士赋序》：

夫立德之基有常，而建功之路不一。何则？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，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。存乎我者，隆杀止乎其域；系乎物者，丰约惟所遭遇。落叶俟微风以陨，而风之力盖寡；孟尝遭雍门而泣，而琴之感以末。何者？欲陨之叶，无所假烈风；将坠之泣，不足烦哀响也。

其次，词句讲求对偶。先秦经、史、诸子之文已有对偶之句；西汉作者所写的骈句因渐趋整齐，遂更易形成自然的对仗，因非有意为之，故亦不必尽工。贾谊《过秦论》：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

后半四句，四四相对，六六相对，字面上颇为工整；但不仅上下联一意，而且四句都是一意，虽可收极力渲染、加强语气之效，却未免稍嫌重叠，难逃冗赘之讥。至若：

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铤枻以鞭笞天下。……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讐。……然后斩华为城，因河为津；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谿……

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；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；废王道，立